

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發展、策略與方向¹

林顯明

摘要

本研究以比較教育的視角，探討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發展脈絡與策略作為，並將歷程分為萌芽期、奠基期、轉型期與確立期四個階段。在萌芽期（2000年前）的階段中，臺灣高等教育仍處於自1990年代後所經歷之政治民主化與社會自由化的調整階段，因此，此階段的高等教育治理與政策重點主要關注於如何擴大高等教育系統在教學、研究與學習環境的自主性。對此，在萌芽期的階段，臺灣高等教育系統的外籍生人數較為有限，且主要是來自與臺灣擁有政治與地緣關係密切互動的美國與韓國籍學生為主。而此階段的韓國，韓國政府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也是採取較為謹慎的策略，此時期的韓國高等教育系統並不強調吸引外籍生至韓國就讀，且韓國學生欲前往海外就讀也是必須要透過國家篩選與政府薦送的方式才能獲得此機會。另外，在進入奠基期（2001-2008）後臺韓兩國政府開始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來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工作，其中，臺灣教育部公布並在《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引導下，正式將國際化納入到高等教育發展與治理的核心位置，但此階段所強調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是向歐美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習並與之建立多元的教學和研究網絡關係。韓國則在同時期推動「Study Korea」計畫，積極吸引外籍學生並提供獎學金與簽證便利措施，展現出韓國從此階段開始即積極的進行高等教育國際化和招收外籍生之作為，而相關策略作為的成效也清楚的呈現於韓國就讀之外

《註1》本文之研究成果感謝國立高雄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及韓國中央研究院，「以臺韓關係研究活化地區研究的臺灣韓國學以及建構東南亞地區樞紐的韓國學基礎」（計畫編號：AKS-2020-INC-2240001）的支持。

籍生人數的增長。而轉型期（2009-2016）為臺韓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深化的重要階段。臺灣方面隨著兩岸民間社會與高等教育系統交流的政策開放，因此，有為數眾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來臺就讀，此現象也促使並改變了當時在臺就讀之外籍學生人口結構與高等教育地景。韓國政府主要是透過「在地國際化」的策略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而其中在仁川建立國際大學城的做法即是一著名的例證。到了確立期（2017 年至今）的階段，臺灣透過「新南向政策」的推動來積極吸引新南向政策國家學生赴臺就讀、發展 EMI 課程和建立國際學院等作為，希冀逐步打造臺灣高等教育成為區域導向之教育樞紐；韓國則朝向全面外向型發展，結合政府、產業與大學力量，打造以全球教育樞紐為目標的高教體系。整體而言，臺韓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經驗展現出了「方向性」與「空間性」轉變的意涵，臺灣逐步建構區域連結，韓國則強調擴展全球影響，也展現出了同樣身為發展型國家的臺灣與韓國在全球教育治理下，積極透過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實踐來強化國家競爭力與傳播國家軟實力的多重目標。

關鍵字： 高等教育、國際化、臺灣、韓國、外籍學生

壹、前言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臺灣與韓國常被視為相似案例來進行比較，其中，臺韓兩國在戰後所經歷之類似經濟發展經驗，更是許多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而臺韓兩國在戰後現代化過程中所創造之傲人經濟成就，不僅使得兩國名列亞洲四小龍（Asia Four Tigers）的行列，對此，學者們以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論概念來說明國家與政府在臺韓兩國經濟與社會各面向發展所扮演之積極性和重要性的功能與角色（Chu, 2019）。在發展型國家的特徵下，過往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臺韓兩國教育體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以配合兩國經濟發展之方向來進行教育政策發想與規劃，而具體的表現在經濟高度成長時期大量資源投入到發展技職教育中現象，並期待技職教育體系能回應臺韓兩國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需求（Lo & Gu, 2008）。

另外，臺韓高等教育地景與大學機構的數量在千禧年後有了明顯的增長，而如是的增長事實上也和臺韓兩國於 1990 年代起所致力於發展之高科技與服務業有關；值得一提的是，臺韓兩國的第三級產業（服務業）在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亦超越了第二級之工業生產活動。對此，在面對兩國產業發展的快速改變，臺韓高等教育體系也經歷了明顯的數量增加，臺灣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從 1990 年的 40 所大幅成長至 2023 年的 145 所；而同一時期，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也從 1990 年的 124

所成長至 2023 年的 422 所，由此可見，臺韓兩國高等教育體系與機構的數量在近數十年當中皆經歷了快速的增長（教育部，2023；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版，2024）。

臺韓高等教育系統所經歷快速之數量增加的意義，即是創造出大量的生源需求和提高了大學錄取率，對此，如是之高等教育的擴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臺韓兩國在 1990 年代後經濟發展與轉型所需之人力需求，然而，如此的擴張卻和臺韓兩國於 1990 年代後人口結構的變遷方向相悖。事實上，臺灣與韓國皆在 1984 年左右面臨到育齡婦女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低於維持一國人口與規模之人口替代水準（2.1 個小孩），且據統計，2024 年時臺灣與韓國的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分別為 1.11 和 1.12，名列全球生育率最低和次低的國家。而臺韓兩國除了超低之生育率外，近年來影響臺韓社會發展與人口結構的因素尚包括快速發展之社會老化（aging）現象。據估計，臺灣在 2025 年底時 65 歲以上人口將占總人口比率達 20.8%，進一步成為超高齡社會；而韓國方面則早臺灣一年在 2024 年時即成為了繼日本之後第二個進入到超高齡社會的東亞國家（張淪萍，2024）。在低出生率與快速老化之人口結構等因素的衝擊與影響下，對於高等教育機構之經營與發展所造成最明顯的影響即是就讀大學之學生人數的下降，臺灣從 2023 年始大學一年級之新生人數即低於 20 萬人，且據估計至 2040 年時大一學生人數將進一步低於 15 萬人；相同的，韓國

在 2020 年時大一入學的人數約有 46.4 萬人，然而，此一人數至 2040 年時據估計將減少約四成左右，至 28.3 萬人（楊綿傑，2023；林芳穎，2022）。

由上述可見，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體系之發展不僅共享了類似的特徵，包括國家主導性強及教育發展方向須在很大程度上回應兩國於不同階段之經濟發展需求等；另外，除了共同的特徵外，臺韓高等教育系統近年來所面臨的經營與挑戰也是相似的，包括因超低出生率與兩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所帶來之大學生來源不足等問題，在在都造成了臺韓兩國之高等教育系統面臨了嚴重的招生挑戰。對此，爲了補足兩國國內學生人口數日益減少所帶來的衝擊，臺韓高等教育系統在新世紀千禧年後也都不約而同的開始投入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工作當中，而在本研究的脈絡中，「高等教育國際化」被界定爲一個多構面且具動態性的過程，指高等教育機構基於多樣性的理由與需求，透過制度性設計與具體行動，積極推動跨越國境的人員流動（包括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學程與課程的合作或設置、教育資源與服務的交流，以及政策和治理機制的互動與移轉等。此一過程不僅強調國際化輸入與輸出的雙向性，更重視其如何在制度、組織與社會層面產生具體的效能以及所可能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此一定義承襲了 Knight（2008）所提出「將國際、跨文化或全球維度整合進高等教育目的、功能與實踐過程」的觀點，並兼採 de Wit

（2020）與 Brandenburg 等（2019）的進一步闡述，強調國際化應被視爲持續性的制度轉化歷程，而非單一政策結果或表面的活動數量變化。

爲了在跨國比較研究中確保分析的可比性與可操作性，本研究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進一步劃分爲五項主要構面：其一爲「流動性構面」，涵蓋學生與教職員的跨境流動、學分互認、雙聯學位與海外實習；其二爲「課程與教學國際化構面」，涉及在地課程中融入國際視角、英語或多語授課、跨國線上課程及國際共同課程設計；其三爲「跨國合作與制度整合構面」，包括國際學術合作、研究聯盟、海外分校及認證制度互認；其四爲「支援服務與文化交流構面」，著重國際學生支援機制與跨文化互動的促進；其五則爲「政策制度與資源配置構面」，關注政府與大學在戰略規劃、法規鬆綁、經費投入與績效管理等面向的安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議題已非新的概念，但當前針對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系統之國際化實踐與具體作爲的比較研究尚不多見。對此，爲了補足當前研究之不足，本文將針對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策略、措施與實踐作爲進行梳理與比較，並運用高等教育國際化之類型學（Typology）理論架構，進一步詮釋與分析臺韓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政策意涵與效果。以下的段落將依序梳理與說明包括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概念、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與具體作爲，

並運用高等教育國際化之類型學來詮釋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方向，最後，也將針對當前臺韓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未來研究方向提出討論與建議。

貳、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概念與驅動力

過往的研究已指出，驅動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系統投入國際化作為的因素是多重且複雜的，學者們將這些驅動因素歸納成四大因素，包括學術因素（Academic）、政治因素（Political）、經濟因素（Economic）、和社會因素（Social）等（Knight, 1997; Lingard & Rizvi, 1998; Yang, 2000）。

在學術因素方面，所指的是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基於學術發展之教學與研究需求，而投入國際化的作為，具體的做法包括選送本國學生赴海外高等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和取得學位，或透過不同之高等教育人才引進管道來吸引和聘用外籍高等教育人才；另外，促進本國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之教研人員在教學與研究上進行交流與合作，也是各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學術國際化時所常採用之作為，而其他學術因素還包括一國高等教育機構欲增加在國際學術社群與指標中之影響力或國際排名等。政治因素方面，隨著一國經濟發展或一國希望能在國際場合上取得更大話語權與影響力的驅動下，透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作為來增加一國在區域或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許多國家是出於政治或外交考量而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資源特別提供給某

些國家的學生（例如邦交國），藉此來作為鞏固兩國邦誼或藉此彰顯彼此友好之象徵。經濟因素亦是許多國家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驅動力，不可否認的是，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僅是一項教育工作，在引進國際學生及送出本國學生的過程中亦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而國際學生就讀的過程中亦會透過繳納學費以及日常生活消費等方式為接待國社會創造經濟價值；對此對於擁有為數眾多之國際留學生的國家和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國際教育是一個能夠創造收益與經濟價值的教育事業，而其所創造的經濟貢獻對於國家而言亦是相當重要的。最後，在社會因素方面，如何促進不同國家與社會間之民眾相互瞭解與友好關係的建立，亦是一國在思考高等教育國際化所能扮演之功能與角色時常被提及的觀點，以高等教育作為平台的方式來促進不同世代（特別是年輕世代）與不同國家社會與民眾間的彼此認識、互動與交流，藉此進一步的促進雙方的跨文化溝通與理解能力，也是許多國家選擇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時的重要考量（Knight, 2007; 2010; 2012）。然而，有論者也提醒，在真實的社會中，一國之高等教育體系投入到國際化工作並非僅是受到單一因素所驅動，相反的，上述各種因素在不同國家之高等教育系統發展的不同時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驅動的力量皆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一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驅動力是複雜、多變且常是為了符應國家與社會在不同時期之發展脈絡與需求而來（Altbach &

Knight, 2007)。

然而，由於高等教育國際化常涉及人員、知識與教育資源等在不同國家間進行跨國界流動，因此，許多研究高等教育國際化論者常採用推拉理論 (Push and Pull Theory) 的觀點來去探討學生選擇離開母國並前往異國求學的思考與對策。推拉理論框架的分析重點著重於探索國際學生之母國 (Home country) 及接待國 (Host country) 整體政經、社會環境及高等教育體系的各種正向吸引力及負向推力，會如何進一步影響到學生選擇是否留在母國接受高等教育，亦或是離開母國前往其他國家攻讀高等教育之學位 (Bodycott, 2009; Bodycott & Lai, 2012)。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推拉理論的觀點被相關論者批評過於線性思維，僅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簡化為學生之母國與接待國兩點一線的關係，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過程不僅和教育流動的方向有關，且也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現象發生的空間有所關聯。對此，受到 2000 年後社會科學對於人們國際移動研究之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思維的發展與概念影響下，跨國社會空間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的概念愈來愈被重視 (Faist, 2010)。然而，在跨國主義中所提及之跨國社會空間並非是一個可視的物理性空間，相反的，跨國社會空間是透過人們在跨越國境間移動所伴隨而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面向的快速且綿密的交流與互動所創造出來的社會性空間 (林顯明, 2023b)。對此，上述理

論觀點的發展提醒了吾人，學生透過高等教育國際化所促成之跨越國界的移動，須同時考量到學生國際移動的方向性與空間性兩個構面，以及這兩個構面對於學生及一國之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產生了什麼樣的意義、效果與影響。

對此，近來有愈來愈多的論者希望透過將高等教育國際化進行類型學之分類方式，來補足傳統上僅將高等教育國際化以方向性的概念化約成輸出與輸入兩種類型所可能產生之二分法的缺失。此一觀點不僅過於線性，也未將高等教育跨境流動的空間性構面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與效果納入考量。在本文中，研究者運用了 Wu (2021) 和趙鶴 (2023) 所結合之高等教育國際化方向性與空間性兩個構面發展出來之類型學分類架構作為本文分析與詮釋臺灣和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實踐經驗的依據。對此，研究者欲進一步指出的是，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研究脈絡中，Wu (2021) 與趙鶴 (2023) 的兩篇研究所提出之整合性觀點有其理論架構上的新意與重要性。

首先，Wu (2021) 的研究運用了「內向取向」(inward-oriented) 與「外向取向」(outward-oriented) 兩個軸線用來作為分析不同國家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化策略之分析架構，透過這兩個主軸概念的運用，Wu 的研究提供了吾人一個擁有四類型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象限，讓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構面更有系統性的被歸納與統整，補充了過往有關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討

論傾向於分析輸出與輸入的線性關係，以及過於強調國際化活動類型或清單式整理之呈現方式等所進行之事實性（facts）的探討，但缺乏理論架構性的觀點與詮釋所產生對於高等教育國際化分析之不足。Wu 進一步抽象化了這些活動背後的方向性邏輯，所謂「內向取向」指的是透過引進國際化之資源、課程或規範來強化本地高教體系，而「外向取向」則代表高教體系主動將教育服務、研究成果與制度模式向外輸出。這種運用方向性之概念所做之類型學分類的貢獻在於能將各種具體活動納入到同一個分析框架，使比較研究更具可操作性與通用性，也使國際化研究超越單純的活動描繪，轉而強調其空間性的特徵及所展現出來之國際化理論意涵。

趙鶴（2023）則是從國家政策與比較教育的角度切入，在前述「內向／外向」之方向性構面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空間範圍」的構面，並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空間性區分為全球與區域兩個層次，並依此提出「全面外向型，區域聚焦型，過渡轉向型，戰略內向型」四種國際化類型。趙鶴的研究不僅補充了 Wu 的方向性構面的分析，也回應了當前高等教育國際化已逐漸成為國家治理與政策工具重要一環的事實。他強調，國家在推動高教國際化時，背後往往存在更深層的战略考量，包括經濟發展、地緣政治與文化軟實力的建構等，因此僅從活動或方向來理解高等教育國際化，已不足以掌握其複雜性。趙鶴的類型學進一步的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現象

的「方向性」構面與「空間性」構面進行了結合，更揭示了不同國家選擇某種國際化模式是有其複雜性的思考邏輯與推動思維，使其框架更貼近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與國際化發展的真實樣貌。

換言之，Wu 與趙鶴的研究分別從方向性構面及空間性構面兩個面向補足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線性思維所產生之不足，而他們的研究不僅提供了互補性的觀點，且結合方向性與空間性構面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分析框架也讓吾人能更加有系統的認識與瞭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複雜性及所帶來的多樣性意涵。因此，本文採用 Wu 與趙鶴所提出之類型學框架來作為本文分析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與實踐策略的分析基礎；在他們所提的整合性架構當中從跨境流動的方向性觀點，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類型分為引進型為主和輸出型為主兩種類型。而所謂的引進型所指的就是一國之高等教育系統的國際化策略，主要是透過引進所欲學習或吸引之國家的高等教育人才和教學研究資源進入到本國之高等教育機構，來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相反的，輸出型為主則意指為一國之高等教育系統發展已相對成熟，且也是許多國家欲學習和借鏡的對象，因此樂於將高等教育的資源和相關教學研究能量往海外輸出。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空間性構面方面，可再依據高等教育國際化所發生的地理範疇是屬於全球導向為主還是區域／地方導向為主來進行劃分。對此，同時考量到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方向性與空間性兩

表 1 高等教育國際化類型學

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方向性與空間性	引進型為主	輸出型為主
全球導向型為主	全面內向型	全面外向型
區域 / 地方導向型為主	區域內向型	區域外向型

資料來源：整理自Wu（2021）和趙鶴（2023）

構面後，吾人可將高等教育的類型進一步劃分成全面外向型、區域外向型、全面內向型及區域內向型四大類，如表 1。

以下，研究者將運用上述四類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類型學分析架構來作為本文分析與詮釋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實踐經驗的意涵。

參、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策略與實踐經驗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實踐經驗至目前為止可分成四個階段來加以認識與理解，分別為：

一、2000 年前的萌芽期

在這個時期中，國際化還未成為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在辦學與學校經營時所主要關注的議題，因此時期的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尚處於臺灣社會與政治環境於 1990 年代後所經歷之自由化與民主化轉型過程的調適階段。因此，在這個階段，臺灣高等教育系統的主要治理議題在於回應經濟與社會愈來愈自由化且愈來愈往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浪潮下，高等教育系統如何進一步

回應當時臺灣社會與國家發展、轉型及民間社會對於教育體系亟需改革的聲浪與需求。另一方面，隨著臺灣政治環境之民主化改革議程於 1990 年代後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如何解構過去長時間以來因威權統治而導致國家與政府高度涉入大學學校治理，所產生對於高等教育機構在自主發展與辦學自主性等面向上產生限制等議題，即成為了當時高等教育系統在回應當時臺灣社會與政治環境快速變遷的情況下所主要關切的議題。此時期，具體的事件包括 1994 年透過修正《大學法》來讓大學擁有對於課程架構與內容更大的決定權，以及賦權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學校的發展方向能夠有更多的自主性等，都奠定了往後臺灣高等教育機構之自主性與後續推動大學自治的社會脈絡與法律環境基礎（楊瑩，2008）。對此，在高等教育國際化尚未成為重要議題的這一個時期，據統計，1975 年前，至我國留學的外籍學生人數皆低於 1,000 位，1980 年代初期也僅有約 3,000 餘位，此人數到了 1990 年代中期突破至 5,000 位，且如是的外國學生在臺留學的人數與規模一直都維持類似的水準直至新世

紀的初始才開始有了改變。對此，在 2000 年以前至我國留學的外籍學生來源中，以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最多，其中，來自韓國的外籍生人數即占了當時來自亞洲外籍學生數的一半左右，另外，來臺留學外籍學生的另一大宗則是來自美國的學生（中華民國教育統計，1990；1995；1999）。

2000 年以前我國外籍學生主要之組成是以韓國和美國爲主的原因，有論者認爲主要是受到當時的政治背景所影響，重要的因素即是受到二戰後國際秩序與東亞地緣政治中之反共政治環境與聯盟氛圍所影響。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與韓國皆在國際反共聯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我國無論是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與安全需求的滿足則須來自美國的協助和支持。在如是的國際情勢與地緣政治脈絡下，臺灣高等教育環境中之國際化程度在新世紀以前還相當有限，至使得當時臺灣高等教育系統中之外籍生來源主要是來自於上述與臺灣地緣政治有著高度關係的韓國與美國等兩個國家爲主，而來自其他國家的外籍學生人數則還相當有限，在人數與規模上不足的情況下，使得當時進一步推展國際化的議題還尚未成爲高等教育系統治理當中的重要議題，而當時高等教育國際化對於臺灣高等教育系統而言還尚處於萌芽的階段（河凡植，2018）。

二、2001-2008 年的奠基期

直至時序進入新世紀後，臺灣高等教育系統與國際化的發展圖像就有了明顯的

轉變。在經歷了 1990 年代後以來一系列之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以及教育改革政策的施行與推展後，相關法律規範逐漸賦予了高等教育機構對於課程內容的教授方式、課程綱要的規劃以及學校治理等相關層面能夠擁有更大的自主性與裁量空間。相關政策與法律規章的修改與推行例證則包括在 2000 年首次由民主進步黨取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後所頒布之一系列高等教育相關政策中，例如在 2001 年時，政府公布了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此白皮書公布時的脈絡背景是在全球化與資通訊產業快速發展，因而帶來之影響和衝擊不明確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包括臺灣）與高等教育系統皆開始思考可以如何來應對新世紀以來，全球化與資通訊產業快速發展所可能產生之各方面的影響進行回應。在這樣的脈絡下，當時的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提及應針對可如何進一步打破傳統過於靜態且封閉的高等教育環境與課程安排方式，並爲了因應未來快速變化的世界與產業經濟發展趨勢，進一步尋求跨領域課程與學系整合的方向來做努力（教育部，2001）。在當時的教育政策白皮書中，除了已開始構思該如何突破傳統學科疆界所產生之知識僵化的問題，且也在該次的白皮書中第一次提及了臺灣當時高等教育體系國際化程度不足的問題，對此，在該份白皮書中也首次提及了招收外籍生來作爲推動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可行策略的思考。政府在新世紀初始幾年陸續公布了數份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相關的政策方案，包括在 2002

年所公布的「挑戰 2008 的國家重點發展計畫」、2005 年公布的「教學卓越計畫」、2006 年公布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簡稱頂大計畫）」等一系列與促進臺灣高等教育發展和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系統國際化程度的國家級教育政策計畫。

在上述這些國家級政策方案中，高等教育被賦予了推動整體國家走向國際化，並期待高等教育的體系能在國家面臨全球化快速變遷的情況下扮演積極的角色；另外，為了回應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所提及當時高等教育系統國際化程度不足的問題，政府特別選擇了 12 所公私立學校為所謂的「頂尖大學」，並在頂大計畫經費的支持下，強化獲選學校的國際化程度及國際招生的吸引力。而這些學校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及長庚大學等。而除了追求在國際大學排名名列頂尖大學並追求提升國際化的目標外，在頂大計畫下也補助了包括國立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和元智大學等 5 校設立頂尖研究中心，在在都顯示了當時臺灣政府在推動高等教育治理工作時，追求頂尖以及提升國際化程度是其中兩項重要的目標（教育部，2024）。

研究者認為此階段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推動的策略與作為展現出了區域內向型之類型特色。對此，Yang（2024）的研究指出，這一個時期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展現出為了服膺以及期待在以

西方為主導之全球高等教育系統遊戲規則中脫穎而出的企圖心；而此時期具體的策略和作為包括透過與歐美知名大學院校進行研究與教學合作的方式，來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系統在全球高等教育環境與招生市場當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Yang 在文章中表示，因為臺灣無論是在經濟或學術發展上，在國際社會乃至於世界知識生產體系的位置，尚處於世界體系理論中之半邊陲的位置，也因此，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臺灣高等教育系統與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體系大多仰賴運用西方的理論觀點來說明、解釋或詮釋臺灣經驗的個殊性，或者將臺灣的經驗放置於更廣泛之比較研究的觀點中來闡述或詮釋臺灣經驗與區域內（外）國家經驗間的異同之處。而上述階段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作為所展現出之區域內向型的特徵即呼應了 Yang 的觀點，對此，劉國兆（2014）針對頂尖大學計畫所進行之後結構主義論述分析的研究發現亦與上述有所呼應。劉國兆指出，頂尖大學計畫所勾勒出的國際化圖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現代化、西方化、市場化與自由化的高等教育系統發展想像，而如是之圖像所呈現出來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作為即展現在當時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學習、運用、詮釋，乃至於證明西方主流理論在臺灣經驗上的適用性充滿了熱情，也期待透過與歐美高等教育機構合作進行研究與交流的策略和作為，能進一步的讓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排名獲得改善，躋身世界知名學校之列，並在此過

程中尋找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在國際高等教育環境和知識生產體系中的自身位置與自我認同感。

三、2009-2016 年的轉型期

在經過了追求頂尖與國際排名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後，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作為到了 2008 年時有了明顯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當時臺灣所經歷之第二次中央政權的政黨輪替，以及當時由馬英九總統所領導之國民黨政府對於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想像與前一階段有著明顯的不同。上一階段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主要是向歐美高等教育系統進行學習的策略，在馬英九總統於 2008 年上任後將改善兩岸關係作為其施政的重點，在此施政優先順序的排序上，馬英九政府對於臺灣整體社會和高等教育系統之國際化策略的想像是「從中國大陸走向世界」，而並非如前一階段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所強調之「從世界走向中國」的世界觀。陳水扁政府的世界觀較強調把臺灣放在全球的脈絡下進行理解與認識，因此，相較於國民黨政府所持之世界觀，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會更將傾向將相關的資源與關注力先投注到非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和國家。對此，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秉持著改善兩岸關係以及應從中國大陸走向世界之世界觀下，馬英九前總統在上任之初即在所謂「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下推動與中國大陸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多面向的正常化與交流工作（林顯明，2017）。

在此政治基礎下，馬英九政府為了讓中國大陸學生能來臺就讀高等教育機構，並建立臺灣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學生、教師等多層面的交流制度與互動機制，因而啓動了一系列的修法工作，包括在 2010 年 8 月 19 日修正並通過了包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等法律，藉此為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讀，以及臺灣學生赴陸就讀和雙邊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法律依據。如是的開放對於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可以說是一個劇烈性的改變，其原因在於兩岸於 1949 年後至此之前的高等教育系統互動因政治因素的關係是相當有限的，因此，這樣的開放，不僅標示了 2011 年起為兩岸高等教育系統交流的元年，也因為語言和文化背景較為相近的緣故，因此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讀的人數在 2011 年開放後旋即出現明顯的成長（林彥宏，2010；人事月刊，2008）。

從表 2 可知，兩岸高等教育系統開放交流與互動的第一年共計有 928 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選擇來臺灣攻讀學位，但有超過 1 萬名（11,227 位）的中國大陸學生選擇來臺進行短期交換或研修，於 2011 年時在臺就讀之學位生與研修生的人數就共有 12,155 位。而在短時間內如此大量的中國大陸學生至臺灣就讀也改變了外籍生在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內的組成與學生地景，以 2011 年為例，當年度在臺就讀之外籍學生人數逾 2 萬人（21,356 位），若拿該年度陸生在臺就讀的人數與外籍生總數相比，臺灣開放中國大陸學生赴臺就讀的第

表 2 陸生來臺研修及修讀學位統計

年度	研修生	學位生（100 年起招生）		合計 （研修生 + 學位生在學數）
		新生註冊人數	在學數（含舊生）	
100	11,227	928	928	12,155
101	15,590	951	1,864	17,454
102	21,233	1,822	3,554	24,787
103	27,030	2,553	5,881	32,911
104	34,114	3,019	7,813	41,927
105	32,648	2,835	9,327	41,975
106	25,824	2,139	9,462	35,286
107	20,597	2,140	9,006	29,603
108	16,696	2,259	8,353	25,049
109	4	576	6,032	6,036
110	0	588	4,293	4,293
111	22	377	3,121	3,143
112	2,523	378	2,128	4,651
113	2,296	128	1,556	3,852
114	2,424 (1-8 月)	-	-	-
總計	212,228	20,69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25）。

一年陸籍學生的人數就占了該年度外籍生總數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見，在經歷了十數年兩岸高等教育系統無法交流後的開放元年，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對於陸籍學生而言有著明顯的吸引力。2011 年後，中國大陸學生至臺就讀的人數（包含研修生與學位生）逐年成長，其人數最高峰為 2016 年，人數為 41,975 人，此一數值與該年度外籍生總人數之 116,416 人相較，業已占了逾三分之一的比率（36%），上述都顯示

了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招收外籍生在馬英九政府時期有了明顯的變化（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25）。而如此為數眾多的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讀，確實也對於當時的臺灣高等教育環境、社會氛圍與兩岸互動關係帶來了不小的衝擊與影響，而許多陸生在臺就讀期間也面臨到了在文化相似性情況下，依然需要花費時間與成本進行生活適應與文化和認同協商等問題（胡俊鋒，2014）。

對此，林顯明、宋宥賢（2015）的文章指出，與同一時期國際學生來臺就讀人數增長的幅度相較，中國大陸學生此一時期大量的來臺就讀對於臺灣高等教育之系統、學校氛圍、課堂風景以及兩岸學生彼此間日常生活互動等面向，皆產生了許多因文化和思維差異等所造成之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s）。值得一提的是，馬英九政府時期大量開放中國大陸學生至臺就讀和留（遊）學的國際化作為與政策實踐可謂是臺灣高等教育史與追求國際化過程中一段特殊的經驗，不僅是因為兩岸高等教育在經歷了十數年相互無法交流後的第一次接觸，更是因為至2016年後，因民進黨籍之蔡英文取得中央執政權後，因兩岸關係又趨緊張的緣故，陸生至臺就讀或臺生赴陸接受教育的現象有了大幅度的減緩與人數的下滑。因此，2024年時，陸生在臺就讀（包括學位生與研修生）的人數僅剩3,852位，與高峰期的2016年相比，其所剩的比例已不到一成。雖然陸生至臺就讀之人數受到兩岸關係氛圍的影響而出現快速成長與顯著下滑的現象，但此時期臺灣整體外籍生的人數依舊還是成長的，這樣的現象也展現出了此階段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在推動國際化作為的思維已有所轉變，已可更有自信的將自身高等教育體系所提供的教育資源與教育服務向外進行輸出；從高等教育國際化理論的觀點來看，此時期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已逐漸地從上一階段的區域內向型往區域外向型的方向進行轉型。換句話說，此階段的臺

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已不再如前一階段一樣僅強調和主流與西方之高等教育機構來進行學習，相反的，臺灣高等教育系統能夠有自信的招收來自包括中國大陸的外籍學生，並也展現出對於輸出自身之高等教育資源與服務的自信與信心（天下雜誌，2019）。

四、2017年至今的確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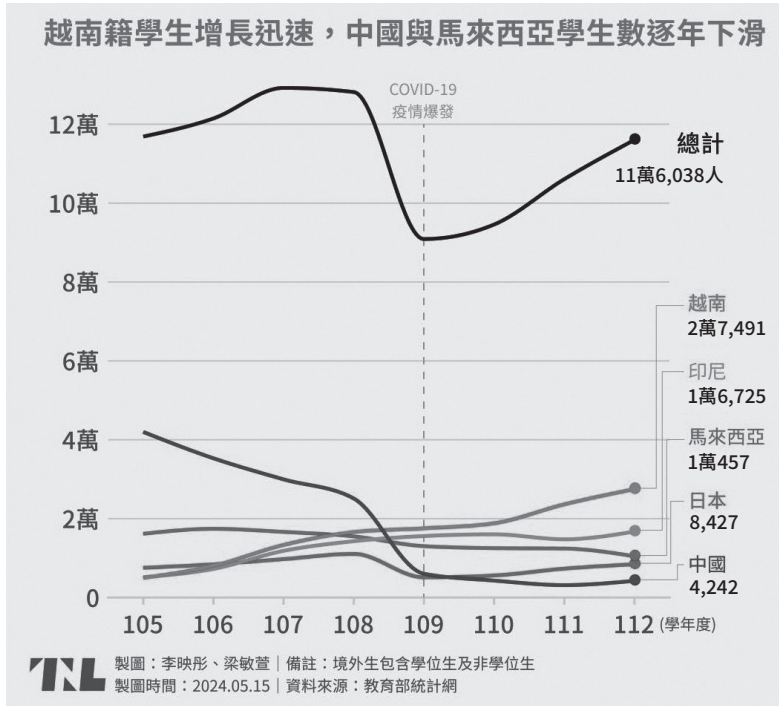
尤有甚者，不同於上一階段臺灣馬英九政府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很大程度上著重於吸引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讀，並投注大量的資源與經費來推動兩岸高等教育機構的交流與互動。2016年後，由於民進黨籍之蔡英文總統取得了中央的執政權，且在民進黨所持之「從世界走向中國」的世界觀下，蔡英文政府提出了迥異於前一階段的區域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亦即「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來作為拓展臺灣國際空間和促進臺灣與區域鄰近國家交流的臺灣國家區域戰略。不同於先前馬英九政府所曾經推出之南向政策的內容，大多僅關注在促進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與雙邊投資；此次蔡英文政府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中，特別強調以人為本的區域戰略觀點，臺灣與新南向政策國家間的關係不能僅停留在經貿關係的層面，而是要透過促進彼此人民與民間社會相互互動的方式，藉以進一步地促進雙邊民間社會的相互認識、友好互動，藉此深化臺灣與新南向政策國家在各個層面的深度交流與互動。在這樣的轉向下，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在新南向政策的思維下，不僅扮演了拓展臺灣在海外國家軟實力的功能，透過積極吸引新南向政策國家至臺就讀並促進雙邊民間社會與人民相互交流等作為下，臺灣高等教育系統也被賦予協助國家與政府拓展在新南向政策國家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之學術外交（Academic Diplomacy）功能（林顯明，2018b）。在新南向國家當中，馬來西亞長期以來皆是新南向國家學生赴臺攻讀高等教育的主要來源，而馬來西亞會長期占據來臺就讀人數與群體之首的原因在於馬來西亞擁有新南向國家中為數眾多的華人移民社群，而這些華人移民社群過往並未受到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下產生對於傳統儒家及中華文化的破壞，相較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系統與環境因為受到政治體制的影響，因此其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自主性和自由度受到很大的影響。另外，也因為馬來西亞政府在其國內教育資源分配與制度建立的過程中，常將華人群體排除在外並給予差別對待等內外因素的考量下，臺灣高等教育系統所擁有之自由與開放的學習環境以及和馬來西亞共享之文化親近性等，皆使得臺灣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成為馬來西亞僑生選擇至海外留學的首選（Lin & Sung, 2020）。

然而，上述臺灣高等教育吸引馬來西亞學生的優勢，在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馬來西亞政府逐漸地開放馬來西亞華人辦理高等教育機構等政策開放下，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另外，由於一帶一路

亦是中國大陸政府用來與帶路沿線國家進行交流、互動並且進行高等教育機構招生的重要戰略，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所提出來之一帶一路戰略與臺灣所提出來的新南向政策，在東南亞的範圍內就出現了相互重疊以及高等教育機構招生對象相互競爭的問題（林顯明，2018a）。這也使得馬來西亞學生來臺就讀之人數在 2017 年達到高峰之 17,419 人後逐年下降，到了 2023 年時僅剩 10,457 人，減少幅度達四成。對此，為了補足因馬來西亞學生來臺人數減少所造成的影響，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強化了對於其他新南向政策（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招生，其中，來自越南和印尼之學生選擇臺灣作為他們留學目的地的人數成長最為明顯（杜晉軒，2024）。2014 年時，越南學生來臺就讀的人數僅有 3,715 人，然而，此人數在往後的十數年間逐年成長，截至 2023 年時，越南在臺就讀的學生人數達 27,491 人，成長幅度逾 600%；而在臺就讀之印尼學生方面也從 2014 年的 3,559 人，大幅成長至 2023 年的 16,725 人，其成長幅度也逾 370%。另外，來臺就讀之泰國學生人數也有明顯的增加，2014 年時僅有 1,535 人，但在 2023 年時則來到 6,118 人；菲律賓方面，2013 年時有 566 名學生選擇至臺灣留學，但此數值到了 2023 年時增加至 3,755 人。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和緬甸來臺就讀之學生人數亦有明顯的增加，2013 年時僅有 23 位巴基斯坦學生來臺就讀，到了 2023 年時此數值來到 418 人；緬甸方面，2013 年在臺就讀的

圖 1 105 至 112 學年境外生人數變化 (2005-2008)



資料來源：杜晉軒 (2024)。

緬甸學生有 488 人，到了 2023 年時成長至 2,074 人。若從新南向國家學生整體來看，2013 年時有 25,289 位學生從新南向國家赴臺就讀，而到了 2023 年時此一數值大幅成長至 71,012 人，成長幅度達 180%；且與 2023 年當時在臺就讀之外籍生總人數 116,038 人相較，來自新南向國家之外籍生人數已占當年度外籍生人數總數逾六成 (63.4%) 的比例。相較之下，2023 年時，中國大陸學生在臺就讀的人數已大幅減少至 4,651 人，僅占該年度全體外籍生在臺人數的 4% 左右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2024)。由此可見，臺灣在推動新南向政策的脈絡下，確實對於提升臺灣高等教育系統在新南向國家的吸引力有著明顯的幫助，確實也呈現了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作為與上一階段相較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林顯明，2018b)。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脈絡反映出外籍學生來源結構與國家策略導向之間的互動與變遷如圖 1 所示，從早期以來自美國和韓國的外籍生為主，到開放兩岸社會與高等教育系統交流之政策下陸籍學生的大量成長，

再到「新南向政策」頒布後，來自新南向政策之國家外籍生人數成爲主流，其所展現出來的發展趨勢不僅是外籍生在臺灣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組成結構變化，更是臺灣對於如何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的不同觀點和策略作爲調整的具體展現。另外，從高等教育國際化理論與類型學的觀點來看，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作爲已從早期「區域內向型」逐步努力並期待進一步往「區域樞紐型」(regional hub model)的目標邁進 (Lin, 2020)。在如是的目標下，近年來具體的做法則是由教育部透過經費補助和政策引導的方式，鼓勵高等教育機構提升以英語爲授課媒介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的課程比例，藉以提高臺灣高等教育環境課程之國際化程度，並藉此打造對外籍學生友善的修課與學習環境。亦有愈來愈多高等教育機構透過整合校內師資與課程資源等作爲，設立全英語授課學位學程或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的方式來強化國際化之教學量能，並作爲吸引外籍學生的重要策略作爲，皆可見到臺灣高等教育系統爲了進一步追求成爲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區域樞紐目標所做的相應作爲與努力 (Chen et al., 2024; 周宛青, 2024)。

肆、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策略與實踐經驗

韓國高等教育之發展與臺灣共享著許多類似之處，對此，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發展亦可從以下四個階段來加以認識：

一、2000 年前的萌芽期

如上所述，韓國與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發展型國家以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爲目標的概念下，在韓國經濟快速成長的 1980 年代期間，高等教育被政府所賦予的角色與期待是爲了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及爲各產業發展提供所需之高品質的人力資源。在此目標下，國際化的議題在當時的韓國高等教育系統中還尚未成爲重要的議題，爲了讓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成爲當時韓國政府發展產業時的重要人力資源，因此當時的韓國政府對於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特別對於開放韓國本國國民赴海外求學所持的態度與立場是較爲保守的。此時期韓國政府對於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策爲管制型單向輸出政策 (controlled outbound mobility)。當時的韓國政府擔心若全面開放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策略與場域後，將可能導致眾多韓國學生選擇赴海外求學，進而導致人才外流 (brain drain) 以及無法提供產業發展之人力需求等問題。因此，當時韓國政府是以提供政府獎學金的方式來薦送由政府所選拔出來之人才赴海外求學，並以學習和帶回西方先進技術與理論後返回國內作爲當時的教育政策目標 (Han & Lee, 2010)。如是的情形到了 1980 年代末後開始有了些許的改變，例如，韓國政府爲了舉辦 1988 年漢城奧運會進一步將國際人員流動之管制政策放寬，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韓國政府爲了舉辦奧運會而放寬了相關人員流動跨境

管制政策，然而韓國高等教育機構有較明確之國際化作為則是要等到 1990 年代中期後才逐漸成形；同此時期後，韓國政府修正了過往之管制型單向輸出的高等教育政策，允許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招收國際學生並執行引進之國際化政策（inbound policy）。然而，開放性政策到了 1997 年時又出現了變化與轉折，其中 1997 年因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不僅導致了當時韓國政治、社會、教育與文化等各領域面臨到嚴重的衰退，至使得高等教育機構雖然擁有了招收海外學生的權力與空間，但受到整體國家發展面臨動盪的影響，因此 1990 年代中後期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執行引進策略的成效依舊有限（Green, 2015）。

二、2001-2008 年的奠基期

韓國在經歷了 1990 年代的金融風暴並邁入新世紀後，韓國政府在受到國際組織對其政府體系與產業部門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及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期待與要求下，不僅執行了一系列的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化和相關擲節開支的政策作為，相應的，韓國政府也因此高等教育系統的治理作為上採取了更多具開放、寬鬆與解除管制的策略作為。例如，在金大中政府時期（1998-2003）透過設立由總統府直屬之教育改革委員會，針對韓國之高等教育系統發表教育改革政策，並進一步針對限制新設大學院校之政策進行去管制與推進自由化之目標，促使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在此時期有了明顯的

表 3 韓國外籍生人數變化（2005-2008）

年份	外籍生人數
2005	22,526
2006	36,800
2007	49,270
2008	58,100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Korea (2024)。

成長。

據統計，於 1990 年時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為 265 所，到了 2000 年時，此一數量大幅成長至 372 所，成長率逾四成。除了開放對於高等教育機構設立之管制，並使其更具自由化外，金大中政府也推出了第一期的 BK21（Brain Korea 21, 1995-2005）計畫，目的是要促使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往世界一流的方向邁進。在這個計畫下，鼓勵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和韓國學者與世界一流大學進行教學與研究之合作，並共同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藉此進一步促進韓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Kwon, 2012）。到了盧武鉉政府時期，推動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目標更加明確，此時期，韓國政府除了繼續執行 BK21 的第二階段政策外，亦在 2004 年推出赴韓國就讀（Study Korea Project）的計畫，此計畫的政策目標是希望在 2008 年時吸引 5 萬名國際學生至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此政策的推出不僅標示了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前一階段已有所不同，且此時的韓國社會也逐漸走出了金融風暴

對於其政治、經濟、社會與教育等各層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並能更有自信的透過引進國際學生的方式來促進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

對此，據統計，千禧年前，在韓國就讀的外籍學生人數低於 2,000 人，占整體韓國高等教育學生人數的比率甚微，而上述所呈現出來的數據也證成了上段所述，亦即在千禧年前雖然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已在 1990 年代中期時即獲得了較大的空間與政策上的支持來推動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工作，但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獲得落實並能具體展現成效的時間，則是要等到千禧年後才逐漸展現 (Jeon et al., 2023)。而到了新世紀的 2000 年時，外籍學生在韓國的人數約有 3,963 人，隨後逐年成長，到了 2005 年時，此數字已成長至 22,526 人，成長幅度逾四倍 (468%)，到了 2008 年時更是進一步成長至逾 5 萬人的規模如表 3。韓國在 2000-2008 年間與所有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相較，韓國在吸引國際學生的增加幅度與成長率高居 OECD 國家之冠，足見韓國政府在此階段因修正了上一階段之管制性政策，並積極的透過吸引外籍生至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等政策措施與作為，確實已在千禧年後逐漸達至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效果。

三、2009-2016 年的轉型期

經歷了上個階段逐漸開放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得以擁有更大的空間與自主性能夠

表 4 韓國外籍生人數變化 (2009-2018)

年份	外籍生人數
2009	75,850
2010	83,200
2011	89,537
2012	92,400
2013	85,923
2014	90,000
2015	91,332
2016	100,000
2017	123,858
2018	135,000

資料來源：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2024)。

招收外籍生至韓國就讀後，到了 2009 至 2018 年期間，韓國政府在推動與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目標時所採用的相關策略性作為，亦進一步呈現出更加多元的成長。

從表 4 可知，在 2009-2018 年期間赴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外籍學生人數有了更明顯的增長，2009 年時，該年度在韓的外籍學生人數達 7.5 萬人左右，其後則逐年上升，並在 2016 年時突破 10 萬人大關，並在 2018 年時進一步增加至 13.5 萬人。2018 與 2009 年相比，十年間，在韓外籍生人數的成長幅度近八成 (78%)。由此可見，此時期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在推動國際化工作和吸引外籍生赴韓就讀的策略作為和成效已愈來愈明顯。而除了引進的策略外，此時期韓國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作為也愈來愈多元，其中課

程的跨域交流、爭取海外大學至韓國設立分校，以及強化外籍生畢業後的留用與職業媒合等，在在都是韓國政府此時期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政策與具體作為。

(一) 課程交流計畫 (Curriculum exchange programs)：

不同於傳統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強調實體移動 (physical mobility) 的模式，課程交流計畫則是透過多元化工具的使用，例如 ICT 與網路傳播設備的運用，來提供無法進行實體移動的學生也能夠在韓國境內之高等教育機構擁有進行國際化交流與體驗的機會。在具體的實踐方面，虛擬交流 (virtual exchange) 即是一種用來彌補實體國際移動不足的可行替代性方案 (林顯明, 2023a)；亦即透過數位工具的運用將韓國國內與國外合作學校的學生聚集在一起，並以一起修習一門課程的全部或一部分的內容來促使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學生可以在一個安全與舒適的虛擬與數位學習環境中，學習如何進行跨文化溝通、語言交換，並藉此培養參與學生的跨文化素養、溝通能力、同理心以及國際觀等相關學習目標 (Wylie, 2020)。除了虛擬的課程與交流活動外，如何在實體課程當中提供韓國本地學生和外籍生可以進一步擁有相互交流與跨文化互動的機會，亦是此一時期韓國高等教育機構所努力思考並期待進一步促成的國際化策略與目標。對此，其具體的做法包括透過與海外合作學校簽署合作意向書、允許學生在不同國家間進

行課程學習並在返國後進行學分抵免等，實際的案例，例如透過與美國、日本、歐洲等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學生可以選擇修讀韓國大學開設的英語或雙語課程，或韓國學生可參加由海外大學所提供的線上課程或短期學習機會等，藉此運用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資源來獲得以課程交流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經驗。

另外，在此時期，因韓國高等教育機構愈來愈積極的進行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與目標的推動，因此，要如何在一方面推動國際化策略與目標的同時，又要確保國際化的教育活動與學習經驗能夠保有一定的教育品質，對此，在此時期，伴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作為快速推動的同時，建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等相關的改革 (quality assurance reforms) 作為，亦是此時期在韓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治理的重要課題。另外，除了課程交流與品質保證機制的建立外，在促進以課程為基礎之高等教育國際化多元策略作為方面，此時期韓國高等教育機構也積極的透過與海外大學合作建立雙聯學位 (Joint / Double Degrees) 的方式，提供韓國學生能夠同時擁有就讀韓國和海外合作之高等教育機構的機會。而雙聯學位的合作形式多元，不同之韓國高等教育機構與海外合作大學的合作方式容或有所不同 (例如，雙聯學位是同領域還是跨領域、要在韓國大學或海外大學分別就讀多久時間、學分如何採認、論文如何進行指導、撰寫以及口試等相關的把關與評核標準等)，對此，雖然

不同學校間所協議出來之雙聯學位訓練與把關標準個殊性差異大，然而，雙聯學位的教育宗旨即是希望參與學生能同時擁有在本國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經驗，藉此讓參與學生能同時擁有本國與外國高等教育學習與交流的機會，而在參與學生皆通過了本國與外國學校對於雙聯學位的相關規定與要求後，即會得到來自本國大學和外國大學所共同頒授（Joint Degree）或分別頒授（Double/Dual Degree）的學位證書（林顯明、宋宥賢、王俐純，2020）。此時期韓國各高等教育機構所推動的雙聯學位學制，包括位於京畿道水原市的 Ajou University，即是在此時期推動雙聯學位的先驅學校。Ajou 大學於 2010 年初期即和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和伊利諾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建立雙聯學位學制，並且有了 Ajou 大學成功的經驗後，目前已有愈來愈多之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加入了提供學生透過雙聯學位學制同時獲得在本國與赴外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學習並取得雙邊學位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機會（Kim, 2020）。而此階段在韓國政府確立了高等教育國際化品保機制與雙聯學位學制後，也進一步的替韓國政府開啓了另一項重要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亦即後續在仁川所推動之國際學園計畫（Shin, 2018）。

（二）仁川國際大學城 Incheon Global Campus（IGC）設立：

韓國政府有感於長期以來韓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國際化策略大多是仰賴本國學

生赴海外留（遊）學的方式進行，能夠在大學期間獲得相關資源或獎助赴海外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的學生人數，在整體韓國高等教育學生人數中畢竟還是少數，因此，如何彌補傳統高等教育國際移動現象多是從亞洲國家輸出學生往全球北方國家（Global North）進行學習所呈現出來之流動性不均衡的狀態，韓國政府開始思考可以如何改善上述的狀況，而「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被認為是一項可能有效的策略。

與傳統高等教育國際化強調全球南方國家（Global South）選送學生至北方國家學習的作為不同的是，在地國際化強調的是，將教育國際化的資源帶到本國的高等教育環境與場域中進行實踐，或者是在本國的教育環境中創造更多元和多層次的國際化學習環境。而韓國政府此時期透過在仁川地區建立國際大學城的策略，也標示了韓國政府開始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有了更多元與靈活運用的可能性，也進一步展現出了韓國政府與社會對於自身高等教育品質與環境有了更強的自信心，期待透過在仁川建立國際大學城的形式推動韓國從過往高等教育輸入的國家，邁向成為能夠將韓國高等教育資源進行輸出的國家。而韓國政府在仁川國際大學城所邀請的學校大多是西方國家著名的高等教育機構，對此，也展現出韓國政府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上已突破區域性的限制，並逐漸朝向以全球為範疇來進行思考與推動的視野與企圖心。在目前仁川國際

大學城當中，共吸引了來自全球共四所大學在此設立分校。其中，來自美國的紐約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於 2012 年成爲第一個在仁川國際大學城設立分校的海外大學，其後 2014 年美國的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也在此地設立分校；另外，同年來自比利時的根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和美國的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也相繼在仁川設立它們的國際分校。在仁川國際大學城的網站中，也清楚標示了韓國政府設立此一國際大學城的目標，即是希望透過更多元化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的實施，希冀能夠進一步的讓韓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力與擴展性突破其在東亞的地域性限制，並期待韓國進一步轉型成爲位於東北亞的全球教育中心（Ko et al., 2019）。

（三）強化就業媒合與人才留用：

除了上述在地國際化的策略外，韓國政府亦開始思考當韓國政府與社會花費了大量的資源進行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後所培養的人才可以如何進一步的爲韓國社會所用，並成爲韓國發展產業與經濟活動的人力資源；同時韓國政府亦進一步開始思考可以如何加強媒合從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學成或畢業的外籍生留在韓國勞動力市場就業與服務的可能性。據 2024 年之調查，在韓國求學之國際學生中每 10 位就有 8 位學生願意在他們畢業後留在韓國繼續就業；雖然外籍學生很高程度上皆表達了他們願意在畢業後繼續留在韓國就業，但以 2022 年的統計數據來看，該年度僅有 6% 畢業

之國際學生成功的留在韓國就業（Choi, 2024）。因此，如何進一步提升韓國企業願意聘用外籍畢業生的意願，並協助有意願在學成後繼續留在韓國就業的外籍學生得到相關工作資訊與媒合機會即成爲此時期韓國政府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爲時重要的配套措施。

韓國政府之中小企業暨新創事業部（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 MSS）在此階段特別設立了 K-WORK 工作媒合網站，這個由政府部門所成立之媒合平台，所從事的主要工作與服務僅專門提供給外籍人士和外籍畢業生所使用，藉以協助外籍人士和外籍生進行就業市場工作的媒合，並且協助外籍人士與外籍生處理在勞動力市場當中所面臨的相關問題與困難之處。另外韓國政府在協助外籍學生進行工作媒合的過程中是透過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關係的建立，藉以進一步整合包括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和中小企業暨新創事業部等三大韓國中央政府部會的資源，協助外籍人士與外籍生進行工作的尋找及就業後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的釐清與爭取。此公私協力關係還進一步整合了韓國不同公私部門所成立之人力媒合平台（Public & Private Recruitment Platform）的職缺資訊，也整合了各地方政府與大學的相關產業發展方向和教學研究資源，構建出結合多元公、私部門和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資源與訊息平台，藉此建立外籍人士與外籍學生在韓勞動力市場媒

合與資源（訊）整合的生態系統，以達到育才後留才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目標（K-Work, 2024）。

四、2017 至今的確立期

在經歷了上一階段韓國政府多元化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作為的實施後，2017 年迄今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不僅在數量上有著明顯的增長，且隨著韓流（Hallyu）文化及韓國國家軟實力（Soft Power）大規模地在亞洲和非亞洲地區的快速傳播，亦進一步提升了各國民間社會與高等教育系統對於學習韓國相關文化與知識的興趣。從統計數據來看，在韓就讀的外籍生人數於 2019 年時已逾 16 萬人，隨後的幾年，在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的影響下，使得赴韓就讀之外籍生人數有所下滑，但在疫情過後即快速反彈並增加，到了 2024 年，在韓就讀之外籍生人數已超過 20 萬人，不僅達到歷史新高，且與 2018 年相比，2024 年在韓就讀之外籍生人數成長幅度超過三成。除了數量的增加外，韓國政府積極地將韓國相關知識向外拓展，並期待能促使韓國發揮以全球為範疇之國家軟實力的例證，還包括韓國政府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在各洲域推動韓國學（Korea Studies）並搭配韓流文化的輸出。韓流文化在走過了 1990 年代末與千禧年代初期，因部分國家擔憂韓流文化在境內擁有過大之文化影響力，進而導致此時期出現所謂反韓流文化的現象（葉寶玉，2018）。

表 5 韓國外籍生人數變化（2019-2024）

年份	外籍生人數
2019	160,165
2020	153,695
2021	152,281
2022	166,892
2023	181,842
2024	208,962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Korea (2024)。

韓國政府於新世紀（特別是 2010 年代）後修正了前一階段在傳播韓流文化過於強調之韓國國家形象與民族主義的情形，並透過產業政策進行扶植與大力支持的情況下，透過明星藝人結合韓國與西方流行文化之元素來創造相關之音樂、電影、電視、遊戲與舞蹈等文化產品，不僅成功地將具有韓國特色之流行文化產業輸出至海外，也順勢將韓國國家軟實力之影響力輸出海外，並將其影響力擴展至亞洲以外的地區和國家（河凡植，2016）。先前所出現之反韓流或反韓之事件與情緒在近年來業已大幅的減少與下降，且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的十數年間，以全球為範圍的韓流社群（Global Hallyu Communities）的數量快速增加，2012 年時全球的韓流社群數量為 757 個，成員人數有逾 900 萬人（9,624,220），十年後的 2023 年，全球韓流社群的數量大幅成長至 1,748 個，成長幅度逾一點三倍，而參與社群之總人數也大幅增加至逾 2 億人（224,974,073）。對此，無論是從全球韓流社群或社群成員的

數量來看，其在過往的十數年間每年皆是以倍數的方式成長，由此可見，韓流文化在全球範圍內之擴散能力與影響力快速成長的現象愈來愈明顯（ISSUU, 2023）。

在韓流文化的助長下，據調查，當前海外共有 313 所高等教育機構開設有韓國學相關課程，其中有 127 所海外高等教育機構僅開設韓國學相關課程但並未授予學位，約占總體數量的四成，而有授予韓國學相關學位的學校共有 155 個，且其中有 122 所高等教育機構頒授與韓國學相關之博士學位，所占比例也近四成（38.9%）。在這 313 所海外高等教育機構中，有 149 所僅用韓語進行相關課程之教授，而另有 128 所學校使用雙語（韓語和英語）來進行韓國學相關課程之教授（王曉玲、董向榮，2022）。截至 2018 年止，韓國國際交流財團已在海外設立了 7 個事務所，並在北美、歐洲與大洋洲等設立了韓國學諮詢委員會，藉以更有系統性和制度化的協助海外韓國學社群之發展。而在促進韓國學與相關議題之結合與全球化方面，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為此設立了韓國學全球化研究項目，藉此希望能讓韓國學相關的學術發展突破國別的限制，並能以更為宏觀和多元的視角來探討韓國與韓國人在全球和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領域及事件脈絡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帶來的理論意涵（林玄鎮、范柳，2021）。

在上述的基礎下，韓國學已在不同地區與國家累積了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有論者針對韓國學於歐美國家高等教育機

構之發展進行歷史性的爬梳與討論，亦有論者期待透過針對韓國的案例研究來進一步促進韓國經驗與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間理論視角的結辯與對話（Howard, 1994；Armstrong, 2014）；也有論者針對韓國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進行討論，且他們研究的分析層次甚至已不再僅是運用國家為層次的分析觀點來進行研究，而是更深入的探討韓國學在中國大陸不同地區（域），例如東部地區、中部地區以及西部地區等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情形，以及中國大陸不同地區（域）與韓國國家、社會與文化等多層次和多樣貌的互動關係與交流情形，對此不僅展現出了韓國學在中國大陸快速之發展，也呈現了韓國學的知識建構與傳遞在中國大陸之不同地區（域）的多樣性特徵（王向遠，2022；程鈺情，2019；張美紅、胡靜，2018）。尤有甚者，韓國學在過去較少被關注到之新興地區的發展狀況亦有逐漸受到重視，例如韓國學在中亞地區（Central Asia）的發展（Belyalova & Park, 2022）及在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的發展（Javier et al., 2022）等研究成果皆已陸續被發表。

綜合上述討論可見，過去三十年來，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策略與作為展現出明顯之發展軌跡多元化的趨勢，其中，特別呈現在外籍學生人數快速增長與來源國的持續擴散。另外，在此階段至今，韓國政府是透過結合韓流文化與學術研究雙軌並進的方式來推動相關之國際化工作，並

希望透過雙軌並進的方式將其高等教育國際化往「全球導向外向型」的目標進行推進。換言之，韓國政府在韓流與韓國學已在跨洲際（域）取得明顯之增長且相關研究業已逐漸累積的情況下，韓國對於其自身之高等教育體系在全球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價值鏈上所應扮演角色的期待，已超越了亞洲洲域的限制，並進一步構築了韓國國家本身及其高等教育知識系統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影響力的企圖心與未來想像。

伍、結論與討論

從本文的研究發現可知，臺灣與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歷程在脈絡上擁有許多共通之處。兩國不僅皆展現出國家主導的發展特徵，亦即政府在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政策訂定的過程中，長期以來皆扮演重要的推動者與資源配置者。另外，臺韓兩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發展與變遷也都和各自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與轉型需求有著密切的關係，不論是以教育培育產業人才，抑或以高教作為強化國家軟實力的途徑等皆是明顯的例證。此外，兩國近年來高等教育系統之經營與發展所面臨的結構與挑戰亦相當相似，包括少子女化、低出生率、人口老化與區域大學經營困境等問題。這些挑戰不僅將衝擊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生與師資供給，也促使了臺韓兩國政府進一步思考可以如何藉由透過推動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一方面來補足國內學生人數減少的缺口，另一方面也藉此拓展國際教育的市場，吸引外籍學生進入就讀，並藉

此帶動高等教育系統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雖然臺韓兩國高等教育系統之發展及發展脈絡共享了上述的相似性，但本文研究發現，臺韓兩國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作為與政策方向上卻呈現了各自彼此的特徵和兩國間的差異。從發展階段來看，臺韓兩國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皆經歷了「萌芽期、奠基期、轉型期與確立期」四個階段，但在這四個階段當中，兩國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作為與發展路徑有所不同。本文研究發現，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路徑與方向是逐漸地從區域內向型（inward-oriented regional model）轉向區域外向型（outward-oriented regional model），且主要關注在亞洲區域內的學生流動與教育合作，特別是在 2016 年「新南向政策」的推動下，越南、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的學生已取代早期以美、韓或中國大陸為主的外籍生來源結構。此種區域導向的國際化策略，呈現臺灣以「深化亞洲連結」作為拓展教育外交的主要方向。

相對而言，韓國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更可視為由「管制內向型」轉向「全球導向外向型」（globally outward-oriented model）的歷程發展。早期的韓國高等教育政策為了服膺當時韓國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韓國政府並不樂見韓國民眾赴海外求學，以避免出現人才流失的問題，因此，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作為在早期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管制性作為，並且是需要經由國家揀選才有機會被

薦送至海外進行學習。隨著千禧年的到來及全球化發展的快速變遷下，在新世紀的初始，韓國政府即逐漸地調整了原先以管制為主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並改採積極且透過多元化之作爲來推動高等教育體系提升國際化的策略，這些策略不僅一改過去較爲強調單向性選送韓國學生赴海外學習的現象，並隨著韓流文化的崛起與快速傳播、配合韓國國家軟實力的輸出及韓國學的海外推展、擴大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協力配合下，強化外籍生學成後有機會留在韓國之勞動力市場及邀請國際知名大學至韓國設立分校等策略作爲的實踐，希冀能藉此進一步的促進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往全球導向外向型的方向邁進。

綜合而言，雖然臺韓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方向皆是期待朝向外向型的目標發展，但在策略實踐上各具特色。臺灣的策略更著重於以區域爲範疇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作爲的推展，並期待透過新南向政策的推展以及臺灣在東南亞地區（特別是華人社群較多之國家）的中文與華人文化影響力。相反的，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與作爲則展現了其以全球爲範疇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與企圖心，韓國透過韓流文化及韓國學在跨洲際（域）範圍的推展與快速傳播，藉以吸引超越亞洲區域內學生對於學習韓國文化及韓國學相關知識的興趣，而透過邀請國際知名高等教育機構至韓國設立分校的方式，亦展

現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目標是以全球導向外向型的例證。這些差異反映出兩國在面對全球教育競爭時所採取的不同治理模式與國家定位。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爲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而主要的文件來源包括官方文件、統計數據與學術文獻等進行歸納分析而來，但未直接納入政策執行者、外籍學生或校級管理者的資料與觀點，此部分確實爲本文在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執行上之不足；未來研究可透過質性訪談或量化調查資料的蒐集來進行補充，以更細緻地探討臺韓政府在執行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政策與實際成效的差異。此外，本文著重宏觀政策層面的探討，但未深入分析具體（個別）大學執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經驗與差異，未來的研究可依大學屬性（研究型、教學型、技職型）或所分布的地域等分類進行探討，藉以呈現更具全面性與系統性的比較研究成果。總體而言，臺韓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皆展現了國家面對全球化挑戰下的制度創新與策略調整能力和企圖心，對此兩國的經驗不僅爲亞洲高等教育國際化提供了實踐的案例，也顯示了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當代，已成爲了各個國家展現軟實力與拓展國家在海外學術社群與民間社會之知識與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支柱。

（本文作者林顯明為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人事月刊 (2008), 〈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全文〉,《人事月刊》, 47(1), 2-5。
-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2025), 〈陸生來臺研修及修讀學位統計〉, <https://www.mac.gov.tw/cp.aspx?n=A3C17A7A26BAB048>,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2 月 10 日。
-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1990), 〈民國 79 年教育統計〉,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Education_Statistics/94%E4%BB%A5%E5%89%8D/%E6%B0%91%E5%9C%8B79%E5%B9%B4%E7%89%88.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1 月 6 日。
-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1995), 〈民國 84 年教育統計〉,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Education_Statistics/94%E4%BB%A5%E5%89%8D/%E6%B0%91%E5%9C%8B84%E5%B9%B4%E7%89%88.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1 月 8 日。
-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1999), 〈民國 88 年教育統計〉,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Education_Statistics/94%E4%BB%A5%E5%89%8D/%E6%B0%91%E5%9C%8B88%E5%B9%B4%E7%89%88.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1 月 9 日。
-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2024), 〈113 年教育統計〉,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Education_Statistics/113/113edu.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1 月 15 日。
- 天下雜誌 (2019), 〈來台陸生大減,《經濟學人》: 中國憂年輕人被台灣洗腦〉,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5197?fbclid=IwY2xjawIJQdpleHRuA2FlbQIxMAABHXGZ457qtmDMQN0h3WNHDCvAx1dRvvsjaWcqjtnuSskb_B9cBf1DZH5fg_aem_R1BTI_30NrgRZN3r91jVIQ,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9 月 7 日。
- 王向遠 (2022), 〈從東方學看中國「韓國學」的屬性與特色〉,《東疆學刊》, 1, 1-8, 127。
- 王曉玲、董向榮 (2022), 〈韓國「海外韓國學」構建路徑的轉向: 從單向傳播到多元互動〉,《東北亞學刊》, 65, 120-130。
- 杜晉軒 (2024), 〈在台「外籍白領」最多來自馬來西亞! 這 2 國來台留學人數正攀升〉, Cheers, <https://www.cheers.com.tw/talent/article.action?id=5103246>,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2 月 5 日。
- 周宛青 (2024), 〈高等教育國際化下的新興學校單位: 我國大學國際學院的興起與發展〉,

《台灣教育研究期刊》，5(1)，115-137。

林玄鎮、范柳（2021），〈韓國學全球化的戰略方法論——基於韓流經驗的研究〉，《當代韓國》，3，100-109。

林芳穎（2022），〈韓少子化衝擊 20 年後大學新生人數剩六成〉，<https://tw.news.yahoo.com/%E9%9F%93%E5%B0%91%E5%AD%90%E5%8C%96%E8%A1%9D%E6%93%8A-20%E5%B9%B4%E5%BE%8C%E5%A4%A7%E5%AD%B8%E6%96%B0%E7%94%9F%E4%BA%BA%E6%95%B8%E5%89%A9%E5%85%AD%E6%88%90-05451533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9 月 13 日。

林彥宏（2010），〈一廂情願抑或兩情相悅？陸生來台政策之匯流與轉變〉，《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6(2)，147-180。

林顯明（2017），〈九二共識的變遷與延續：從新制度主義到論述制度論的觀點解析〉，《國家發展研究》，16(2)，101-152。

林顯明（2018a），〈比較中國『一帶一路』與台灣『新南向』之政策內容、執行成效與未來挑戰〉，《放寬一帶一路的視界：困難與考驗》，香港：中華書局，2018 年 7 月，頁 207-263。

林顯明（2018b），〈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與互動情形之現況與發展〉，《新社會政策》雙月刊，57，52-67。

林顯明（2023a），〈高等教育國際移動新趨勢：虛擬交流機制之發展與啓示〉，《台灣教育研究期刊》，4(6)，377-392。

林顯明（2023b），〈國際移民與多樣性治理——臺灣與韓國城市之經驗和議題初探〉，河凡植主編，《臺韓關係的前瞻》（頁 187-215），臺北市：翰蘆出版。

林顯明、宋宥賢（2015），〈「在臺陸生」生活適應與同儕團體相處情形之探究〉，《青年探索》，196，51-60。

林顯明、宋宥賢、王俐純（2020），〈攻讀跨國雙聯博士學制之國際移動體驗與意涵：以比利時臺灣雙聯博士學位學生為例〉，《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4)，65-103。

河凡植（2016），〈政府角色與政企關係：以韓國文化產業發展為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2(4)，155-180。

河凡植（2018），〈臺韓關係的形成與特徵：以建構主義觀點探討〉，河凡植主編，《臺韓關係的發展：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臺北市：翰蘆出版，頁 35-49。

胡俊鋒（2014），《臺灣不是我的家：陸生在臺的認同衝擊》，獨立作家出版。

- 張美紅、胡靜 (2018),〈中國韓國學研究現狀及發展分析——以《複印報刊資料》(2011-2016)轉載來源刊為例〉,《甘肅社會科學》,2, 119-125。
- 張渝萍 (2024),〈南韓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當局力推政策鼓勵生育成效不佳〉,公視新聞網,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30569>,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1 月 28 日。
- 教育部 (2001),〈大學政策白皮書〉, <https://english.moe.gov.tw/dl-4908-88E452B7-6C50-4BF9-BCB0-0CD0C77D4E6E.html>,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0 月 8 日。
- 教育部 (2023),〈112 學年度大專校院概況統計〉,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higher/112/112higher.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0 月 14 日。
- 教育部 (2024),〈教育部部史〉, <https://history.moe.gov.tw/Policy/Detail/2ef4ac64-f0b3-44f5-89ad-faf90f3aca8e>,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10 月 17 日。
- 程鈺情 (2019),〈中西部地區韓國學發展現狀及前景研究〉,《文化創新比較研究》,18, 168-169。
- 楊綿傑 (2023),今年大一新生 19.1 萬人 11 年少 8.7 萬人 / 教部鼓勵各校檢討調整規模 加碼挹注資源縮小公私差距,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591721>,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9 月 14 日。
- 楊瑩 (2008),〈台灣高等教育政策改革與發展〉,《研習資訊》,25(6), 21-56。
- 葉寶玉 (2018),〈中國反韓流對 K-POP 之影響〉,《韓國學報》,32(1), 165-185。
- 趙鶴 (2023),〈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 類型重塑與深層邏輯——基於國際比較視角〉,《中國高教研究》,23(6), 28-34。
- 劉國兆 (2014),〈臺灣「邁向頂尖大學」政策之論述分析: 後結構主義觀點〉,《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4(2), 33-71。
- 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版 (2024),〈受低出生率影湊, 韩幼儿园、小学人数減少 13 万 首次跌破 300 万人关口〉, <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6509>, 最後瀏覽日期: 2025 年 9 月 24 日。

英文文獻

- Altbach, P. G. & Knight, J. (2007),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otivations and realiti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1(3-4), 290-305, Retrieved September 8,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7303542>.
- Armstrong, C. K. (2014),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s of Kore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Korean Studies*, 1(1), 35-48.
- Belyalova, A. & Park, S. H. (2022), Development task and direction of overseas Korean studies to foster global citizens: Focusing on Central Asia,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25(2), 259-288.
- Bodycott, P. (2009), Choosing a higher education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What mainland Chinese parents and students rate as importa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8(3), 349-373,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77/1475240909345818>.
- Bodycott, P. & Lai, A. (2012), The influ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ecision to undertake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6(3), 252-270, Retrieved December 3,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11418517>.
- Brandenburg, U., de Wit, H., Jones, E. & Leask, B. (2019),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society, Brussel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 Retrieved September 28, 2025, from <https://www.eaie.org/our-resources/library/publication/Research-and-trends/Internationalisation-in-higher-education-for-society.html>.
- Chen, R. J.-C., Ho, S. S.-H., Huang, F. & Lu, Y.-Y. (202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aiwan and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6(3), 189-207, Retrieved October 19,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08/IJCED-06-2023-0050>.
- Choi, J. (2024, February 20), 8 out of 10 foreign students willing to work in Korea, *The Korea Herald*, Retrieved October 4, 2025, from <https://www.koreaherald.com/article/3493015>.
- Chu, Y-wah (2019), Democra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s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8(1), 59-80,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2019.1652671>.
- de Wit, H. (2020),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Need for a More Ethical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0(1), i-iv, Retrieved

- November 24, 2025, from <https://doi.org/10.32674/jis.v10i1.1893>.
- Faist, T. (2010), Towards transnational studies: World theories, transnationalisation and chang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 1665-1687, Retrieved September 17,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080/1369183X.2010.489365>.
- Green, A. (2015), Internationalization, deregul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Korea: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4(3), 1-13.
- Han, Y.-K. & Lee, E.-B. (2010), The issues of government overseas scholarship in Korea,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8(1), 131-154.
- Howard, K. (1994), Korean studies overseas, *Asia Journal*, 1(1), 71-92.
- ISSUU (2023), 2023 analysis of global Hallyu status, *The Korea Foundation*,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5, from https://issuu.com/the_korea_foundation/docs/0402_global_hallyu_status_eng.
- Javier, A. C., Lipura, S. J., Rico, M. K. C. S. & Quintana, O. J. C. (2022), Sustaining Korean Studi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Philippin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25(2), 305-319.
- Jeon, M., Hwang, Y. & Hong, M. S. (2023), Recontextualiz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South Korea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knowledge-policy-power interfa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25(1), 124-140,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08/JICE-04-2022-0009>.
- Kim, S. W. (2020),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Korean higher education (1945-2018): A success story, In *The Bloomsbury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 Knight, J. (1997), A shared vision? Stakeholders'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anad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 27-44.
- Knight, J. (2007),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s, 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 In J. J. F. Forest & P. G. Altbach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 (Vol.18, pp.211-228), Springer, Retrieved September 2,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007/978-1-4020-4012-2_11.
- Knight, J. (2008),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realities and complex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urmoil: The Changing World of*

- Internationalization* (pp.1-18), Sense Publishers.
- Knight, J. (2010), Higher education crossing borders, In R. Sakamoto & D. Chapman (eds.), *Cross-border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es and Issues* (pp.16-41), Routledge.
- Knight, J. (2012), Concepts, rationales, and interpretive framework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 Wit & J. D. Hey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p.27-42), Sage.
- Ko, J. W., Wei, Y. & Moon, S. (2019), An analysis of policies towards developing higher education hub in Korea: A case study of Incheon global campu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5(2), 415-432.
- 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2024), 외국인 유학생 유치 현황 및 향후 과제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asks for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CUE Higher Education Issue,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25, from https://www.kcue.or.kr/_upload/pds/2024/06/24/application_341618f994d33e3f63bf6d7197de59dd.pdf.
- Kwon, K. (2012), Government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Kor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12(1), 35-47, Retrieved November 6, 2025, from <http://dx.doi.org/10.17477/jcea.2013.12.1.035>.
- K-Work. (2024), Introduction of support projects, *K-Work Korea*,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25, from <https://k-work.or.kr/bsnsIntren/mtchgSvc/info.do>.
- Lin, A. F.-Y. (2020), Internationalization initiatives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A stepping stone to regional talent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of unbalanced mobility schem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14(2), 69-91,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08/HEED-06-2020-0017>.
- Lin, H. M. & Sung, Y. H. (2020),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untries in Taiwan: Their motivations and negoti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 65(3), 81-122.
- Lingard, R. & Rizvi, F. (1998), Globalisation and the fear of homogenisation in education, *Change: Transformations in Education*, 1, 62-71.
- Lo, W. Y. W. & Gu, J. O. (2008). Reforming school governance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mpowerment and autonomization in school-base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2(6), 506-526, Retrieved October 8,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108/09513540810895435>.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Korea (2024), 국내 외국인 유학생 현황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Korea], 교육부,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5, from <https://ieqa.or.kr/37>.

Shin, J. C. (2018),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s as a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tool in Korea: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and local contex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63, 52-58, Retrieved September 13,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016/j.ijedudev.2017.10.005>.

Wu, H. (2021), A new typology of inward- and outward-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s Outward-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ringer, Retrieved September 29,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6-2558-9_3.

Wylie, M. (2020), Culture and paralinguistic features~!^^(-): East meets West in a virtual exchange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England, *Journal of Virtual Exchange*, 3, 49-67.

Yang, J. C.-C. (2024),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context of geo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Nagoya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24, 243-267.

Yang, R. (2000), Tension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A comparative illustration of the reorganiz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1950s and 1990s, *Higher Education*, 39, 319-337.

The Development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Hsien-Ming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 comparative education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nd strategic approach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dividing their evolution into four phases: emergence, found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During the emergence phase (before 2000),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underwen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social liberalization, with governance focusing on expanding institutional autonomy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ained limited, mainly involving students from polit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affiliat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Likewise, South Korea maintained a cautious stance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overseas study regulated through government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oundation phase (2001–2008), both countries adopted more act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Guided by the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Policy,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corpo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o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emphasizing learning from Western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ing academic and research networks. Meanwhile, South Korea implemented the "Study Korea" program, offering scholarships and visa incentives to attract foreign student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The transformation phase (2009–2016) marked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the

liberalization of cross-strait policies brought a surge of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became central, exemplifi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cheon Global Campus to host overseas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consolidation phase (2017–present), Taiwan has advance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o attract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expand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EMI) programs, and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colleges, aim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a regional education hub. South Korea, in contrast, has pursued a globally outward-oriented model that integrates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strengthen its competitiveness as a global education hub. Overall,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demonstrate a shift in both the direction and spatial ori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aiwan focuses on regional connectivity, while South Korea expands its global presence. Both reflect how developmental states leverage higher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strategic tool to enhanc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project cultural soft power within global arena.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uth Korea, Taiwan